

当代挪威福利国家中的性别平等及 针对已婚育女性的政策

妮娜·贝文

李淑君 译*

【摘要】尽管在不同的国家语境下“工作与生活平衡”的含义可能并不一致，文章主要考察当代挪威针对有儿童的家庭的各种政策方案，同时对家庭如何适应这些政策进行实证研究。虽然从正式文本上来看这些政策项目是无涉性别的，但与男性群体相比，妇女在很大程度上更为积极地响应并适应这些政策项目，从标题就可以看出这一结论。论文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介绍了挪威当前人口与就业模式的概况；第二部分总结了面向拥有儿童的家庭的各种政策项目，并且会进一步把这些政策项目与一些更为广泛的福利国家政策问题及“生活与工作平衡”的主题联系起来。在此基础之上，论文的第三部分及最后一个部分考察了正式的政策目标与实际政策调适和更为普遍理论意涵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挪威 国家政策 福利国家 工作—生活平衡

【中图分类号】D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486(2013)03-0084-17

一、基本概况：人口与就业模式

当谈及“性别平等”“生活质量”和“公共政策视野下的社会服务”这些

* 妮娜·贝文(Nina Berven)，挪威卑根大学斯坦因·罗坎(Stein Rokkan)社会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李淑君，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议题时，有着 490 万居民的挪威被普遍认为是世界上发展得最好的国家之一^①。几十年来，“把工作与家庭生活相结合”或者说“维持‘工作—生活’的平衡”一直被挪威政府视为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目标，而该议题本身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挪威属于“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国家（Esping-Anderson，1990：28）。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大多数的家庭福利政策通过促进“儿童照顾公共补贴”与“育儿休假”的方式明确促进加强女性就业的目标。这些政策的成效在于：女性群体（包括母亲）的就业率较高，而且不中断，同时生育率稳定在 1.95% 这样的相对较高的水平。70% 处于就业年龄段的女性都在从事有偿工作，而男性相应的比例为在 80%（Statistics Norway，2011）。

表 1 列出了挪威人口的年龄组分段情况，揭示挪威人口挑战的程度和类型，这些成为国家制定相应政策的基础。

表 1 挪威基于年龄的人口群体

年龄（岁）	0 - 19	20 - 39	40 - 64	65 以上
占总人口比例（%）	25.8	26.7	32.9	14.6

资料来源：Statistics Norway，2008。

如表 1 所示，挪威总人口中的 25.8% 是年龄在 20 岁以下的群体，他们是政府的家庭政策要现金与服务补贴的重要承受者。例如：拥有一个 18 岁以下的孩子是父母获得任何形式的儿童照顾服务的条件（详细情况将在第二部分介绍）。

第二个群体是在 20 - 29 岁之间的人口群体，占到总人口的 26.7%。由于他们处于生育年龄，所以这个群体在很大程度上会成为各种家庭政策的接受者。例如：青少年儿童的服务（Berven，2010）。

虽然女性生育第一胎的平均年龄是 28 岁，但这个接受者群体的大部分人在一定程度上都与 40 - 64 岁的群体有着共同特征。而 40 - 64 岁的群体占总人口的 32.9%，是如今挪威人口的核心部分。在家庭政策方面，由于他们是社会的中坚力量，笔者将把他们定为付费群体。这一群体主要组成是：孩子已经超过

^① 多年以来，挪威都是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最高的国家之一。（Index of Human Development，2008）

获得现金和服务的年龄条件，整体上该群体的核心特征是已经不再是负有儿童照顾责任。

表格中的第四个组别是 65 岁以上的人口群体，他们占了挪威人口的 14.6%。根据经验以及人们定义“家庭政策”的方式，这个群体同样也组成了一个核心的群体，因为随着人们的年龄增长，他们需要越来越多的照顾及服务，而老人照顾则是挪威以及大多数欧洲福利国家的核心任务之一。这超出了本文关于儿童家庭（妇女）的福利国家政策和“工作—生活平衡”这一普遍议题的实证研究框架。

虽然论文讨论的重点是家庭政策，但仍然需要进一步关注现今挪威的就业模式。其原因在于：第一，福利国家、就业与家庭政策并不是相互分离而是紧密联系的政策领域。第二，也是下文即将深入展开论述的，有偿与无偿的工作分工与性别有着高度关联性，这不仅仅影响到了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影响到福利国家与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关系。

挪威的失业率是 2.8%（2011 年 3 月），其余的大部分人都在某种方式与劳动力市场相关联。这也十分清晰地体现在表 2 中。表 2 显示，70% 处于就业年龄的女性和 80% 处于就业年龄的男性都处于就业状态。其中，在被雇用的女性中有 57% 的人都从事全职工作^①，其余 43% 从事兼职工作^②。男性对应的比例则是 87% 与 13%。

表 2 当前挪威就业情况

	女性	男性
就业率（占 16 - 64 岁就业年龄人数的百分比）	70%	80%
全职工作（占有所有被雇用人数的百分比）	57%	87%
兼职工作（占有所有被雇用人数的百分比）	43%	13%
病假（所有时长）	8.3%	5 %

资料来源：Statistics Norway，2011。

① 在挪威，全职雇佣工作周的工作时间是每周 37.5 小时（Statistics Norway，2011）。
② 兼职工作周的平均工作时间是每周 22 小时，虽然男性与女性的兼职工作会是不同的模式。除了医疗部门作为一个特殊例外，大部分女性的兼职工作都是选择或自愿的。另一方面，男性兼职工作大部分是出于“季节性调整”，例如在旅游业或捕鱼业。例如，在那些兼职时间里，大部分男性都是出于全职工作的阶段性休假中，而大部分女性是在全年中工作一段短时间（Statistics Norway，2011）

尽管挪威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挪威的劳动力市场却是欧洲性别分割最严重的国家之一^①。总体的图景是：大部分的女性都受雇于公共部门，而大部分男性都受雇于私人部门。同时，各种职业类型也因性别而有极大差别。例如，女性在一些照顾和社会服务的职业中占有绝对的比例，而男性则在工程建设、金融及石油工业等行业处于支配地位。此外，在对工作时间变量进行调整以后，女性的收入仅为男性收入的84%。

一个初步的总结是大部分的挪威人都在一定时间段内兼顾了自己的工作与儿童照顾。并且，挪威在生育率、女性兼职就业率与劳动力市场性别分割这几个方面都是欧洲的“领头人”^②。笔者认为，以上的这几个现象是紧密联系的。而且，我认为福利国家的政策和政治不仅仅是这些模式的反映，同时也是造成与维持这些模式的原因。

二、家庭政策与福利国家的重构

家庭政策在挪威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政治中是一个明确主题。儿童照顾的公共责任以及把父母身份和就业相结合（例如体面地兼顾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的政治承诺是挪威（及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作为潜在“女性友好型福利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Hernes, 1987; Bergqvist, 1999）。此外，福利政策与家庭政策及性别平等是紧密结合的。这就意味着，与其他国家及福利体制相比，挪威的儿童照顾和其它方面的照顾责任被解读为不仅仅是私人的责任，还是公共的关注与政策议题。

几十年来，雇佣工作与儿童照顾的结合之所以一直被视为是一项十分重要的问题和政治目标，其原因在于：①当大部分的人同时作为纳税人（例如受雇用者）和儿童养育者时，这种安排有利于产生“未来纳税人”和形成一个相对平衡的人口结构。②高就业率带来高税收收入。这两个因素都将有利于福利国

① 需要对比数据请参见 <http://genderstats.worldbank.org/home.asp> (Database of Gender Statistic, 2008)

② 参见上页脚注②。

家的长期持续发展。③雇佣工作和家庭生活均被认为是公民福祉中极具意义的领域。

在挪威及其他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大多数政策项目都是普惠性而不是选择性的。这表明了诸如养老金、医疗照顾、育儿津贴、教育以及医疗保险等一系列的社会政策项目并不仅瞄准穷人，而是覆盖到全民的，不考虑受众是否具有支付能力（Rothstein, 2000；Esping-Andersen, 1990；1999）。福利国家享有广泛的群众支持作为基础，但这同时也是挪威福利国家未来面临的挑战（Kuhnle & Alestalo, 2000；Esping-Andersen, 2002）。

挪威的体制特点与其较高且平等的物质福利对于理解它的福利政策和相关争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除此以外，其他的一些重要因素还包括：相对较低的失业率和政府对石油部门的高税收。首先，尽管在很多国家福利国家都呈现出种种危机，但这样的图景从未在挪威盛行。福利国家的危机更多地被构建成为一个关于组织和有效性的问题而不是财政问题（White Paper No. 35, 1994 - 1995）。然而，《走向2030年的福利》（Welfare towards 2030）“白皮书”却指出了对现行政策进行调适和调整的重要性，以便为未来的挑战做好准备：

“在我们福利机制的财政方面，政府不会尝试隐藏我们正面临巨大危机的事实。从人口发展的趋势来看，领取养老金的人将会在本世纪之交大大增加。[...] 为了满足未来的国民保险计划财政要求，经济增长是必要的。“工作途径”（译者注：即社会福利体系和劳动市场即就业服务挂钩）是政府为我们的福利机制建立稳固基础的一个必要元素。我们必须为我们所渴望得到的福利创造基础。”（White Paper No. 35, 1994 - 1995, 英文版：第一章）

“工作途径”强调了就业对个人与社会的重要性，暗含每个人都应该力所能及地通过自己的有偿工作来满足自身需求。根据白皮书（No. 35, 1994 - 95：第一章）的内容，强调‘工作’途径将会导致：①福利得以增强且再分配更为公平；②降低从积极就业群体到社会保障受益者的再分配需求；③增加对社会保障财政作贡献的人数。

在白皮书（No. 9，2006－2007）中，“每个人应有能力获得工作与生活平衡”的重要性作为价值得到进一步强调。政府提出，每个人都应该有同样的机会、权利与义务更普遍地参与到社会与工作之中。

在这样的语境之下，家庭政策成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工具，它协助家长们把儿童照顾与雇佣工作兼顾起来。表3展示了挪威面向有幼儿家庭的基本、普遍且最广泛实施的政策计划。

表3 挪威家庭计划（NAV^①，2011）^②

育儿假期	领取47周的全额工资或者领取57周80%的工资
产假	9周的全额工资（分娩前3周及分娩后6周）
陪产假	2周（由雇主决定是否有薪假期）
父亲配额	12周
育儿津贴	每个月423欧元现金发放给1－2岁的儿童
托儿照顾	1－5岁的孩子中有89.2%是在国家补贴的、可负担的幼儿园中。无法定权利。
儿童福利金	18岁以前每个孩子每个月124欧元

资料来源：根据（NAV，2011）整理而成。

在欧洲大部分国家所盛行的福利国家危机并没有在挪威出现，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关于“福利国家重构”的辩论在挪威公共与政治生活中缺席的原因之一。但笔者也认为“福利国家重构”的真正含义及所指并不清晰，这样的不清晰也就意味着要陈述、安排及衡量最终的重构是困难重重的。因此，笔者认为把“福利国家重构”的四种形式加以区分是非常有益的：①缩减现有的政策计划；②废除现有的政策计划；③扩展目前的政策计划；④建立新的政策计划。

挪威面向有儿童的家庭的政策，与第三条、第四条的扩展和建立新政策计划是最为相关的③。

① NAV是挪威劳动和福利局（the Norwegian Labour and Welfare Administration，简称NAV）。（译者注）

② 1欧元=7.8挪威币（2011年11月15日汇率）。

③ 仍然有一些裁减与取消的例子。在1998年，“单亲家长的过渡补贴”政策在变得更慷慨时领取人有资格领取补贴的时间长度却受到巨大限制，同时这个支持计划也与教育及其他的雇佣工作相关联起来。此外，在1997年，对1－3岁儿童家长发放的儿童福利补助金也被转换成了儿童照顾现金补贴（NAV，2008；Berven，2005；Fjær & Syltevik，2002）。

从表3我们可以看出,在儿童第一年生活中的各种亲子假期占家庭政策中一个相当大的份额。这里所说的“扩展”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就已经成为一个趋势:父母假期的总周数从12周逐渐增加到了44/54周。在本文写作的同时(2011年11月),假期更扩充到了2009年7月全额工资补偿金的47/57周(Ministry of Children, Equality and Social Inclusion, 2009)。其中,父亲保留12周假期,即现有的父亲假期额度再延长四周。

在1993年推出的父亲假期额度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例子,它反映国家政策具有成为塑造及改造两性关系的有效工具的巨大潜力。这个把“育儿假期”专门分配给父亲的政策,旨在明确地增强父亲在儿童的童年中角色地位。例如:如果父亲不使用这一假期的话,父母双方都会失去父母假^①。在父亲假期额度推出之前,只有1.5%的父亲会在2周待产假期之外再请假,但到现在90%的父亲都会使用自己目前的假期配额(Håland, 2001; Brandt & Kvande, 1998)。虽然父亲假期配额通常被描述为“软力量”,但这个案例仍然能够支持我关于政治起关键作用(politics matters)的观点。

如果说父亲假期额度可以部分理解为对已有“育儿假期”机制的扩展或者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当作一个新的政策计划,那么育儿津贴(Cash for care allowance)则是过去几十年里挪威家庭政策中“建立新政策计划”的最核心例子了。这一政策计划于1988年推出,旨在为养育1-3岁儿童的家庭提供更多机会去照顾儿童,提供更大的自由度去选择不同形式的托儿项目,增强不同组织形式的儿童照顾项目在公共资源转移到家庭的过程中的公平性(Berven, 2005)。在实践中,这样的改革意味着,所有养育1-3岁儿童的父母在不选择国家补贴的幼儿园服务时都可以选择每月领取等数额的现金津贴,1998年的补贴标准是每个儿童每月3000挪威币(等同于353欧元)^②。除了领取现金津贴而不享受政府补贴的托儿服务这一规定之外,父母可以自己决定如何去协调雇

① 当“育婴假”在1993年被引进的时候,它是42/52周的,而其中的4周是预留给父亲的(NUU 27, 1995)。

② 现在的津贴是每个月3303挪威币(大约相当于389欧元)(NAV, 2008)。

佣工作和照顾儿童的关系^①。在 2005 年，大约有 75% 养育 1-3 岁儿童的家庭领取了儿童照顾现金津贴，这一比例从 1998 年开始就相对稳定在同一水平（Baklien et al., 2001）。然而从 2005 年开始，该比例就一直下降，目前的比例仅有 47.9%（NAV, 2008）。

领取儿童照顾现金津贴比例下降的主要原因可以归咎于近年来幼儿园数量在迅速增长，但同时这个比例的下降也可能与改革中多个同时并存却相互矛盾的目标有关。这个政策计划遭到了左翼反对党的强烈批评，他们认为这是“逼迫女性重回厨房”。评论家们认为，只要为合资格年龄组儿童提供的幼儿园仍然存在用地不足的问题，那么“选择的自由”这种说法就是不合理的。此外，很多人认为“使父母更容易地与自己的孩子相处更长时间”与“为服务提供更大的自由度去选择如何平衡雇佣工作与家庭照顾”是两个相互冲突的目标^②。在这些潜在冲突的目标下，补贴领取率的下降可以有几种解释：既可以理解为挪威女性更倾向于选择就业，表明之前的高领取率只是由于幼儿园数量不足而导致的；也可以理解为仅仅 400 欧元/月的补贴并不足以支付托儿照顾服务；还可能意味着社会的规范和（或）偏好正在发生迅速的改变。

三、存在什么问题？

相对较高的生育率和女性就业水平与广泛的家庭政策之间的相互融合，这二者在挪威相当不错地结合起来。高就业率及高生育率可以提供税源和培养新公民，可以成为未来挪威福利国家制度的有力支撑；这二者的良好结合同时也有利于避免“人口老龄化”现象带来的各种挑战。尽管如此，下文还会证明，这种相对“幸运”的情况仍然面临许多重大的挑战。这些挑战反过来会对于男性/父亲、女性/母亲与工作、家庭和（福利）国家之间的关系在性别方面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些影响与正式的政策目标与实际政策调适状况之间的紧张关系紧密相关，对此本文的第三与最后一部分将会详细分析。

① 原则上，父母也可以选择参与非全日制幼儿园并获得部分的儿童照顾现金补贴，但由于大部分国家支持的幼儿园都是全日制的，部分支付的现金补贴平均发放率较低。在 2008 年 6 月，这个发放率大约是 25%（NAV, 2008）。

② 请看贝文（Berven, 2005）对照顾津贴辩论的广泛分析。

表 4 平均每天雇佣工作时间与家务工作时间

每天平均时间 (小时)	母亲 (孩子在 0-6 岁)	父亲 (孩子在 0-6 岁)
家务工作	5.51	3.37
雇佣工作	2.37	5.37

资料来源: Statistics Norway, 2002^①

表 4 显示, 在 2002 年, 父亲们平均每个工作日花在工作上的时间是 5 个小时 37 分钟, 而用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是 3 个小时 37 分钟; 母亲用在这两项上的时间分别是 2 小时 37 分钟及 5 小时 51 分钟。这些都是他们自己报告的平均数据, 即父母亲们自己向挪威统计局汇报他们是如何分配自己时间的^②。

以上数据也包含那些 0-1 岁孩子的父母们 (即婴儿的父母们)。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何他们上报了相对较多的家务工作时间。首先, 调查中的家务工作是包含了照顾这一项的。其次, 这一个群组中的父母大多数都正处于 47/57 周的育儿假期中, 因此他们花费在家的时间也会比没有假期的时候多。

尽管如此, 母亲与父亲 (孩子在 0-6 岁之间的) 二者花在雇佣工作上的时间分别是 2 小时 37 分钟和 5 小时 37 分钟, 这样的对比差异是更为值得重点关注的。这些差异是相当重要的, 因为对于福利国家而言, 雇佣工作被认为是比照顾工作更为重要的, 许多福利国家的权利资格都会与 (此前) 参加工作关联起来。就这篇文章的目的来说, 父母育儿休假是最相关的例子: 一个人要拿着 80% 或 100% 的工资补偿留在家里跟孩子在一起, 只是要求这个人有一份工作与工资作为补偿的基础^③。这样的例子同样也出现在失业保险, 医疗保障和未来退休金等政策计划中, 当女性作为一个群体, 比男性群体更少地参与到雇佣工作当中,

① 挪威国家统计局的完成了 1971, 1980, 1990 与 2001 年挪威人利用时间情况的调查。本文写作时 (2011 年秋季), 2011 年的最新调查数据刚刚完成但尚未公布。然而, 尽管可以假设父母亲花费的时间有了更公平的趋向 (从 1971-2001 的数据来看), 但仍然有着相当大的差异。

② 还有一些其他的方面被我从表格中剔除了, 因为它们超出了本文研究的范围, 例如睡眠、休闲和学习时间等。更为详细的方法及细节请看 <http://www.ssb.no/samfunnsspeilet/utg/200204/03/tab-2002-10-08-01.html>。

③ 此外, “育婴假” 中父亲的权利超越 “父亲配额” 的权利取决于母亲的就业和根据她收入计算的工资补偿 (Ministry of Children, Equality and Social Inclusion, 2008)。

这种情况导致的短期与长期后果都是高度具有性别特征的^①。虽然详细的阐述与讨论完全超出了本文讨论的范围，但以上提及的情况反过来也引发了问题并需要人们的反思：在雇佣工作与家庭照顾工作二者协调过程中，国家与个人角色应该如何分配？

四、理论意涵与讨论

关于男女在家务工作与雇佣工作上所耗时间不一致的讨论，表明了政策与福利国家的分析仍需对以下问题更为敏锐：性别导致的差异；政策不仅有助于维持现存的“性别秩序”，同时也在改变着它。^②

20 世纪 90 年代期间，一些女性主义导向的学者（如 Orloff, 1993; Sainsbury, 1999; O'Connor et al., 1999）对所谓的福利国家主流研究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以艾斯平—安德森（Esping-Andersen, 1990; 1996）和科尔皮（Korpi, 1983; 1985; 1989）为代表的这些研究在其比较分析中没有考虑到“性别”这一因素。当一些学者正在联合起来共同抵制“主流”框架之时（Sainsbury, 1999），另一些学者则建议利用现存框架下比较研究的优点（Orloff, 1993）。然而，他们必须对框架进行一些修改与调整，例如把“性别”增加到已经存在维度中，并最终增加一些新的维度。

作为后一种路径的代言人，奥洛夫（Orloff, 1993）把“性别”加入到了艾斯平—安德森提出的三个“主流”维度中，同时又发展了两个新的维度去支撑这个框架。艾斯平—安德森的框架主要是建立在他 1990 年《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一书的基础上的。他认为，以下三个维度形成了整个（西方）福利国家的基础：

① 在 1992 年，国家保险计划引入了“照顾工作要点”，这些要点并不代表任何来自国家保险计划的福利，但它们能够为退休人员贡献更高的退休金，只有父母中的其中一个可以收到这些“照顾工作要点”（NAV, 2008.）

② 尽管关于此的更进一步讨论超出了本章的框架，但政策同时需要对分类敏感，例如女性群体与男性群体之间的差别（Berven, 2005; Siim & Borchorst, 2005）。

1. 国家—市场—家庭关系的维度。或者关注“国家活动如何与市场和家庭在社会提供中的角色相结合”(Esping-Andersen, 1990: 21)

2. 分层的维度。这一维度指出,“福利国家”是一个安排社会供给的积极力量,一些政策可能增加了平等性,但与此同时另一些政策却可能降低了平等性。

3. 社会公民权的维度。它指出了普惠型、条件型与资历审查型的福利国家制度的区别。

根据这三个维度,多样化的西方福利国家被分成了几种福利体制——“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以及“保守主义”的福利体制。艾斯平—安德森认为,这些福利体制可以被理解为“原型”,意即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纯粹地属于某一个分类。尽管如此,这种体制分类仍然体现了各种体制类型的国家在试图满足个人及社会福利的总体需求时的各种原则、动态及模式。

总之,每一个国家都有很多福利需求要被照顾到,但处理这些(共同的)挑战或“风险”时,方法路径是多样的、可供自由选择的。“自由主义”福利体制的国家会倾向于把集体风险交由市场去承担(而不是国家或家庭);与此同时,在所谓的“社会民主主义”体制中,国家才是核心的行动主体;而在“保守主义”国家中,家庭却是(或者一直是)首要的承担者。奥洛夫(Orloff, 1993)曾批判过艾斯平—安德森的分类太过于关注国家和市场(与家庭相比)在福利提供中扮演的角色。尽管在形式上被确认为福利体制中的一个支柱,但家庭制度及此外的劳动性别分工(既指家庭中的也指其他情况下的)在主流分析中一直都无足轻重或者被遗漏。

“去商品化”的概念与以上提及的三个维度是紧密相关的。对于“如何及在何种程度上公民可以被定义为‘去商品化’”的问题是十分关键的,因为这些进程在三个类型福利体制中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但这也是女权主义者批判主流研究缺少性别方面考虑的一个关键背景。艾斯平—安德森(Esping-Andersen, 1990: 37)认为,工人并不是像洗衣机一样被商品化。相反,工人们必须生存和繁殖,因此他们面对失业、降薪、竞争和其他一些市场行为时都是脆弱的。

总之，“去商品化”下的逻辑是：个体尽管参与到劳动市场中，他获得收入及待遇的途径越多，那么他的去商品化程度及权力就越大。

举例来说，艾斯平—安德森提出，为了被“去商品化”，个体必须具备选择不参加工作（当他们自己觉得有需要的时候）的能力。然而，这个论证是基于一个“每个个体实际上都有一份工作可以让他们选择不从事”的隐含假设之上的（Berven, 2005: 37）。但正如表2显示，即使是在当代挪威，从总体和整个系统的角度来看，这个假设在女性群体中成立的机会比在男性群体中成立的机会要小得多。或者说，正如奥洛夫所概括的那样：“由于忽略了男性和女性工作者的性别差异，尤其是在家中的照顾工作方面，艾斯平—安德森的理念对于理解‘国家对所有工作者的社会提供（social provision）’是不足的”（Orloff, 1993: 317）。

为了更好地把握社会提供对性别关系的影响，奥洛夫（Orloff, 1993: 318-319）增加了两个维度：获得雇佣工作的途径和形成并维持一个独立家庭的能力。

奥洛夫认为这样的补充是必须的，因为从传统和一般性的角度而言，男性和女性生命周期在养育子女、家庭责任和就业模式方面都是不一样的。

增加“获得雇佣工作的途径”这一个维度，强调了在有偿工作与无偿工作的分类基础之上，性别是如何导致旨在去商品化的社会福利和权利对男性与女性产生不同的影响：总之，我们可以说，很多女性为了在稍后被去商品化而不得不首先被商品化。

女性在传统与一般意义上被认为是无偿照顾工作的主要提供者，这一点也在第五个维度中得以体现：“形成并维持一个独立家庭的能力”。这个维度反映了不同福利体制使得主要照顾者（其中大多数指“女性”）能够在没有配偶收入情况下生活且支撑起一个家庭（例如，不需要因为“物质必需”而结婚或者维持一段婚姻）的程度。与此一致，笔者认为奥洛夫的第五个维度对福利国家的性别维度分析的重要性类似于去商品化概念对于缺乏性别考虑的福利国家的分析。

把这个框架应用到当代挪威的语境中，在兼职工作被广泛使用及劳动市场被性别明显分割的条件下，笔者认为很多双亲家庭实际上是1.5收入的家庭。在

这种情况下，母亲群体与父亲群体由于在照顾责任的不同而在福利国家方面有着不同的关系和权利，因此，我的观点是，照顾既是一个性别问题，也是一个公民身份的问题。

在母亲们仍然无法靠自己形成并维持一个独立家庭的条件下对双亲家庭中男性提供收入补贴，这会对母亲们产生何种影响呢？正如柯妮金和克里莫所提出的：“照顾工作是有偿的还是无偿的，这是政治选择、共同的文化信仰和性别结构的共同影响的结果”（Knijn & Kremer, 1997: 330）。在我看来，这个陈述尽管有些含糊，但是具有很高的相关性：照顾（仍然）是有价值的，问题是如何衡量价值。

一种消极的解释会是，挪威与所有（欧洲）福利国家一样仍然（理所当然地）依赖着家庭制度中由母亲提供的大量无偿照顾工作。另一方面，这个陈述的一个积极的解释则是，不仅性别同时还有政治因素发挥重要作用。也就是说，在有偿与无偿工作的分类问题方面，使用国家政策作为建立性别更加中立的社会的积极手段是可能的。这种中立性可能是通过“让照顾工作有偿”的方式来实现，这跟很多国家用政治作为工具在社会救助方面去实现“让工作有偿”的方式是一样的，问题只是如何做？付出何种代价？针对哪些对象？^①

然而相对而言，在挪威女权主义及性别问题与国家政策有一种很高程度的巧合。这些过程对于解释政府对“性别平等的公共承诺”和对父母照顾责任的确认是十分重要的。换句话说，“生育问题公共化”（reproduction going public）是把北欧国家转变成潜在的“女性友好型福利国家”过程中的核心部分（Hernes, 1987: 9）。一方面，这指出了国家自身通过政策与公共福利服务的扩张，把女性拉入到公共领域中。另一方面，这也指出了女性们通过劳动、企业与政府代表，如何在进入公共领域后开始“推动”与她们自身利益相关的发展。

① 尽管关于这些话题的进一步讨论超出了本文的框架，但一些当下的政策例子可能是相关的。一方面，像照顾现金补贴，照顾工作要点（见本文第93页脚注①）还有“育婴假”中专门的“父亲配额”机制可以被看作是“让照顾工作有偿”的步骤。另一方面，母亲仍然是这些政策项目的主要使用者（除了“父亲配额”），这些政策项目在持续性和资格方面是相对狭隘的。关于“照顾”这一类的更深入思考，可以参照其他文章（Knijn & Kremer, 1997; Tronto, 2001; Fraser, 1994; Wærness, 1987）。

这个双向的过程，例如女性的行动及需求与政治系统中的结构及能力之间的“匹配”，一直都被认为是为北欧女性提供非凡机会或者机动空间的过程（Bergquist, 1999）。

五、结论

正如以上所展示，把挪威描绘成“女性和男性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之上兼顾养家与照顾任务”的性别平等社会的概括性图景是含糊不清的。在很大程度上，“现代”与“传统”两个元素是共存的。关于家庭的各種政策基本上（仍然）更大程度上与妇女和母亲相关联而不是男性和父亲。也就是说，女性作为母亲，仍然在政治上及社会上被期望对福利国家政策做出必要的或“被要求”做出调适，事实也的确如此。此外，“照顾工作是有偿的还是无偿的是政治选择、共同的文化信仰和性别结构的共同影响的结果”（Knijn & Kremer, 1997: 330）。相应地，有偿与无偿工作的区分也与性别密切相关。更为重要的是，这也与公民身份相关，因为很多与福利国家相关的权利都基于对劳动市场的参与。

因此，在当代福利国家研究与欧洲政治辩论中重提性别问题尽管相当重要，但也是矛盾的。正如经常提及到的，在一个更为广泛的欧洲背景之下，挪威和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有相当高的生育率与较高女性就业水平相结合的相对优势。换句话说，大部分在挪威的人们都把工作与家庭生活结合起来了，更具体而言，是他们把雇佣工作与儿童照顾结合了起来。这些因素往往被视为把欧洲福利国家从重构与未来（人口与经济）危机中“解救”出来的各种药方中的主要内容。笔者论证了性别作为有偿与无偿工作区分的一个组织原则和福利国家各种权利的基础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一点，对于建立一个更少性别歧视的社会而言是相当重要的步骤。然而，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危机：如今“性别平等”的复兴纯粹成为了挽救福利国家的工具，而不是为了其本身的首要价值。这反过来也对未来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与新的话题。

参考文献

- Baklien, B., Ellingsæter, A. L. & Gulbrandsen, L. (2001). *Evaluering av Kontantstøttereformen*. Oslo: Norges Forskningsråd.
- Bergquist, C., Eds. (1999). *Equal Democracies? Gender and Politics in the Nordic Countries*. Oslo, Scandinavian University Press.
- Berven, N. (2005). National Politics and Cross-National Ideas. Welfare, Work and Legitim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Norway. Bergen: Rokkan center report.
- Berven, N. (2010). Gender Equality and Policies towards Women as Mothers in the contemporary Norwegian Welfare State. In Kahlert, H. & Ernst, W. Eds. *Reframing Demographic Change in Europe. Perspectives on Gender and Welfare State Transformations*. Berlin: LIT Verlag
- Esping-Andersen, G. (1990).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Cambridg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Esping-Andersen, G. (1996). After the Golden Age? Welfare State Dilemmas in a Global Economy. In Esping-Andersen, G. Ed. *Welfare States in Transition. National Adaptations in Global Economi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 – 31.
- Esping-Andersen, G. (1999). *Social Foundations of Postindustrial Econom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sping-Andersen, G. Ed. (2002). *Why We Need a New Welfare Sta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jær, S. & Syltevik, L. (2002). *Omsorg, Tid Og Penger For Likestillingens Frontløpere. Sluttrapport Fra Evalueringen Av Reformen For Enslige Forsørgere*. Rapport 2 : 2002. Bergen: Rokkansenterets Publikasjonsserie.
- Fraser, N. (1994). After the Family Wage: Gender Equity and the Welfare State. *Political Theory*, 22 (4): 591 – 618.
- Database of Gender Statistic (2008). <http://genderstats.worldbank.org/home.asp>.
- Hernes, H. (1987). *Welfare State and Woman Power. Essays in State Feminism*. Oslo: Universitetsforlaget.
- Håland, K. (2001). *Kontantstøtten – et Veiskille i Norsk Familiepolitikk? En Sammenligning av Kontantstøtten til Småbarnsforeldre og Fødselspermisjonsordningene*. Trondheim: Hovedoppgave i statsvitenskap, NTNU, Institutt for sosiologi og statsvitenskap.

- Index of Human Development (2008). <http://www.nationmaster.com/country/no-norway/economy>.
- Knijn, T. & Kremer, M. (1997). Gender and the Caring Dimension of Welfare States: Toward Inclusive Citizenship. In *Soci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gender, State and Socie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orpi, W. (1983). *The Democratic Class Struggle*. London, England: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Korpi, W. (1985). Power Resources Approach vs. Action and Conflict: On Causal and Intentional Explanations in the Study of Power. *Sociological Theory*, 3: 31-45.
- Korpi, W. (1989). Power, Politics, and State Autonomy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Citizenship.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 309-328.
- Kuhnle, S. & Alestalo, M. (2000). Growth, Adjustments and Survival of European Welfare States. In Kuhnle, S. Ed. *Survival of the European Welfare Stat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Ministry of Children, Equality and Social Inclusion (2008) <http://www.regjeringen.no/nb/dep/bldtemaandre/Fodsels-og-adopsjonspenger/Fedres-rettigheter-.html?id=414878>
- Ministry of Children, Equality and Social Inclusion (2009) <http://www.regjeringen.no/en/dep/bld/Press-Center/Press-releasesfedrekvoten-blir-utvida-fra-seks-til-ti-.html?id=531155>
- NAV (2008). <http://www.nav.no/page?id=248>.
- NAV (2011). <http://www.nav.no/Om+NAV/Tall+og+analyse/Familie+og+omsorg/Foreldrepenger>
- NOU (1995). <http://www.regjeringen.no/nb/dep/bld/dok/NOUerNOU-1995-27.html?id=115764>
- O'Connor, J., Orloff, A. S. & Shaver, S. (1999). *States, Markets, Families. Gender, Liberalism and Social Policy in Australia, Canada, 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rloff, A. S. (1993). Gender and the Social Rights of Citizenship: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Gender Relations and Welfare Stat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8 (3): 303-328.
- Rothstein, B. (2000). The Future of the Universal Welfare State. An Institutional Approach. In Kuhnle, S. Ed. *Survival of the European Welfare Stat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Sainsbury, D. (1999). Gender and Social-Democratic Welfare State. In Sainsbury, D. Ed. *Gender and Welfare State Regimes*.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iim, B. & Borchorst, A. (2005). The Women-Friendly Welfare State Revisited. In Kildal, N. & Kuhnle, S. Eds. *Normative Foundation of the Welfare State, The Nordic Experiment*.

Routledge.

Statistics Norway (2002). <http://www.ssb.no/samfunnsspeilet/utg/200204/03/tab-2002-10-08-01.html>

Statistics Norway (2008). <http://www.ssb.no/befolkning/statistikker/folkemengde/aar/2008-02-21>

Statistics Norway (2011). <http://www.ssb.no/arbeid-og-lonn/statistikker/aku/kvartal/2011-11-02>.

Tronto, J. (2001). Who cares? Public and Private Caring and the Rethinking of Citizenship. In Nancy J. Hirschmann, N. J. & Liebert, U. Eds. *Women and Welfare.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and London,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Wærness, K. (1987). On the Rationality of Caring. In Sassoon, A. S. Ed. *Women and the State: The Shifting Boundaries of Public and Private*. London, Hutchinson.

White Paper no. 35 (1994 - 95): *Welfare Towards 2030*. Oslo, Ministry of Health and Social Affairs.

White Paper no. 9 (2006 - 2007): *Arbeid, Velferd og Inkludering* (authors' translation: Work, welfare and Inclusion). Oslo, Ministry of Labour and Social Inclusion.